文 学 研 究

宋代文学传统中的雅和俗

艾朗诺

(斯坦福大学 东亚语言与文化系, 美国)

摘　要: 我们平常把文化雅与俗之对立归属于社会不同的阶层,高雅文化现象是属于上层社会的,而通俗文化现象是属于下层社会的。这种想法偶然就会忽略所谓高雅文化中也有雅与俗的分别。这篇论文探讨这种比较少注意到的分别,焦点是宋代文坛。当时有一些高官文士,他们的社会地位虽然尊贵,学问极有成就,但他们思想开朗,好像想脱离传统高雅文化的局限,开始注意商人阶级的生活与文化,把较低阶层生活的种种事情写进他们的笔记小说或诗歌。在元明清白话文学发达后,文士引用白话文写戏剧或小说以商人生活为作品的主题是经常有的。但在唐宋文坛中用文言文描写这样的主题比较少见。在宋代笔记小说中这样的作品却偶有出现。南宋时的洪迈在他编的《夷坚志》中这类的故事相当多。北宋苏轼的诗歌中也有这类数量不大的资料。当时一般的学者不太欢迎这类作品,但它对我们现在研究宋代文化史至少有两种作用。它反映比较少提到较低阶层文化的种种细节,并且让我们更了解传统文学作品的局限与偏见。

关键词: 宋代文学;雅;俗;偏见;洪迈;《夷坚志》

中图分类号: I 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8)06-0082-05

提到文学传统中的雅和俗的问题,我们大家首先会想到社会阶层,就是较高阶层相对于较低阶层。这种想法是有道理,但是雅和俗的对立其实并不限于社会阶层,除社会结构之外另外还有些意义。譬如上层阶级中,偶或会出现雅和俗的区别,这种区别不基于社会阶层而基于文化修养(它接近英文所谓“taste”的观念)。身居社会上层的人物,偶尔会做一些事情或说一些话或写出一些文章,让其他文士鄙视为粗俗(英文的“in poor taste”)。说明受批评的人社会地位固然很高,但是他的动作或语言表示他不够文化修养,才会做出这类事情。

然而我们如果不从文人雅士的眼光看,就事论事,往往会发现被贬为不够文化修养的事不过是因它超越了雅文化的局限,当事人思想更开放,眼界更豁达,从而能够包涵多元文化的现象。这些做法或这些人难免受比较保守,自封为维护精英文化传统者的批评。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不必采取保守的看法, 而应该承认雅文化有它的偏见与局限。

这里要举出宋代文学中两个案例。第一个是南宋洪迈与他的《夷坚志》,我要讨论这本书内的两个话题,就是歌妓的形象与时间意识。第二个案例是北宋的苏轼与他的诗歌。这两个案例表明早在宋代,就是朝廷高官,翰林院学士也会重视一些下层社会的文化现象;而一般居于上层社会的文人雅士接受不了洪迈与苏轼的观点,对他们这样做表示不满。这种批判让我们知道宋代最高社会阶层的精英已经有雅和俗的对立与张力。

洪迈的《夷坚志》中的故事保存了许多在正统文献中很少看到的主题,就是提到正统文献经常见到的主题时,《夷坚志》处理的方法也不一样;并且因为处理方法不同,旧的主题经常有新的样子,让读者感到看起来新鲜,原因是他摆脱了传统文士视角。我们注意到《夷坚志》的这方面后,回去再阅读传统文士的文章,对它内容的常规与局限会有新的了解。

收稿日期: 2018-06-16

作者简介: 艾朗诺(Ronald Egan),男,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终身教授,美国东方学会会长。

《夷坚志》内歌妓的性格与表现

首先要探讨《夷坚志》中的故事所表达的思维与观念怎样与精英文学所表达的不同。先谈故事怎么样描写在宋代文献中常见的女性,就是歌妓。我们看看《夷坚志》内两个故事:

红奴儿

池州青阳主簿斛世将,官满还临安。县人刘录事者,亦赴调,寓于它馆。斛过之共饭,饭才罢,又欲同诣肆啜汤饼,刘曰:“食方下咽,势不能即饮,君盍还邸小憩,吾徐往相就矣。”斛去移时,刘往访之,已病卧床上,望见刘,悲泪如雨,良久言曰:“吾死期至矣。适从君所归,穿抱剑营街,未毕,逢一妇人,呼语曰:‘君向与我约,如何始以不娶欺我,既而背之?我病,君略不相视,天地间岂有忍人如君比者?今事已尔,我亦不复云。但君亦且得病,病状殊类我。我虽在此,必不往视君,君勉之。’遂别去。吾行数步,思之,盖昔时所与游倡女红奴儿者,其死三年矣。吾心惘然,追反舍,意绪良不佳。疾势已然,当不能起,奈何?奈何?”刘为作粥煮药,至暮乃归邸。后七日果死。其党能谈其往事者,云曲折病状,皆与鬼言合。盖索买汤饼之时,魂已去干矣。时乾道二年。韩彦端说。①

蔡河秀才

乡人董昌朝在京师,同江东两秀才自外学晚出游,方三月开沟,乱石栏道,至坊曲转街处,其一人迷路相失。两人者元未尝谒宿假,不敢蹑寻,遂归。经日始告于学官,访之于所失处,无见也,乃移文开封府。府以付贼曹窦鉴,鉴到学,询此士姓名,曰:“孙行中,字强甫,束带着帽而出。”鉴呼其隶,使以物色究索。众谓江东士人多好游蔡河岸妓家,则仿其结束,分往宿。月旦之夕,一隶在某妓馆,妓用五更起赴衙参,约客使待己。妓去,客不复寐,见床内小板度上乌纱帽存,取视之,金书“强甫”两字宛然。客托故出门,遍告侪辈。伏于外,须妓归,并妪取缚送府。始自言:“向夕有孙秀才独来买酒款曲,以其衣裘华洁而举止生梗,又无伴侣,辄造意杀之,投尸于河。斥卖其物皆尽,只余此帽,不虞题志之明白,以速祸败。冤魄彰露,何所逃死?”遂母子同伏诛。昌朝说。②

这两个故事差异很大。我们读《红奴儿》就会可怜这位歌姬。她那个男人斛世将,骗过她,说是要娶她而后来不再来找她;红奴儿生病时,斛世将还在京师临安却不来看她。等到红奴儿死了三年后,斛世将又回到临安,街上遇到红奴儿(还不明白遇到的女人是鬼)起初不认得她,以为这位陌生的女人责骂他没有理由。我们知道南宋临安的抱剑营街是很多歌妓住的地方③,所以红奴儿的冤鬼在那附近等待是合理的。《蔡河秀才》中的歌姬则不同,她们几个女人,姓名故事里都不告诉我们,读者也不可怜她们,她们性格残忍,看到太学生孤独一个人来买笑追欢,马上决定要杀死他,脱掉他的衣服拿去卖,还把尸体扔投到河里去。

我们读宋代文学,看到歌姬最多的是宋词。请回想一下:宋词中的歌姬,有这样的人吗?不管是红奴儿,生时被欺骗死后做鬼回来报仇,或是蔡河边上冷酷地杀害无辜的歌姬,宋词中都没有。有什么样的歌姬呢?有很寂寞地等待男朋友回来的,譬如:

欧阳修《诉衷情》

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　　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④

有伤心地想私密事,尴尬地禁不住流泪,但不想让别人看到的:

晏几道《采桑子》

西楼月下当时见,泪粉偷匀。歌罢还颦。恨隔炉烟看未真。　　别来楼外垂杨缕,几换青春。倦客红尘,长记楼中粉泪人。⑤

甚至也会有因男人不理她而生气,想办法惩治

① 何卓编:《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丙志,卷 6,第 412 页。
② 《夷坚志》丁志,卷 11,第 630—631 页。
③ 见〈王从事妻〉,《夷坚志》丁志,卷 11,第 631 页。
④ 唐圭璋编,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简体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1 册,第 157 页。
⑤ 《全宋词(简体增订本)》,第 1 册,第 324 页。

他的：

柳永《锦堂春》

坠髻慵梳,愁蛾懒画,心绪是事阑珊。觉新来憔悴,金缕衣宽。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把芳容整顿,恁地轻孤,争忍心安。　　依前过了旧约,甚当初赚我,偷剪云鬟。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待伊要、尤云殢雨,缠绣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①

这首词中的女主角虽然想办法教训对她不忠实的男朋友。但她绝对不像做冤鬼回来报仇的红奴儿,更不像蔡河边的歌姬无故杀死客人。为什么宋词中没有那种歌妓？因为宋词是很特殊的歌词,它是男性诗人写给女性歌者唱的;不但这样,歌者表演的时候,观众听众多半都是男性,而且是休闲喝酒聊天的男人。他们愿意听一些关于爱情的歌词,而歌词中的女人的声音,她们的思想,动作等,反映的都是男人理想化的女人,整天想念男朋友,等待他,盼望他回来陪陪她。

在文坛地位比宋词低的志怪小说,没有那样固定的功用或表达方式。想象的读者也没有那么的特定。那两个故事里面最有趣的地方是女主人公说话的两段。红奴儿的愤怒,怀恨的气氛溢于言表;蔡河歌姬的冷心,没有后悔地报告当时邪恶的计划,这样的语言要宋词里的女主角说是不可能的,不可想象的。因为来消遣的男性听众,不愿意听这类的语言,接受不了。

《夷坚志》内的时间意识

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话题,是时间意识,也可以说怎么样理解当下与过去的关系。《红奴儿》故事内的鬼,是那位歌姬逝世没有多久回人间报仇的。但是在《夷坚志》其他故事中我们经常见到的鬼,已经死了很久,几代或几百年以后回来人间干事。那么久以后鬼还回来,有种种原因。有的是回到人间要实现某一个承诺,活着的时候没有办法实现,过了几代在冥府还在想念,忘不了。有的是回来要改正历史记录,在冥府发现他们正史中的传记不正确,觉得是毁谤了他们的名誉,回来求朝廷的高官帮他纠正历史文献的记载。但这些旧鬼回来最常见的原因还是为了报仇。这些鬼报仇的故事有个特点:很多是提到前代做官的人伤害了无辜的平民或下属。可是无辜而死掉的平民为什么等了那么久才回来报仇呢？有的说是因为找不到罪人的后代,找了几百年才找到。但是我们很容易想到其他的原因。《夷坚志》中提到宋代贪官或残酷官员的故事不多,也许因为这样的故事太敏感了,但若使残酷的官员生活在唐代,就不敏感,可以说。这样的故事也有另一种作用,让读者知道这样的官员虽然在法律上没有受到惩罚,而且看起来活得长寿安乐,但他早晚会遇到鬼神的报应,晚几代没关系,早晚有一天会伏罪。这种故事一方面可安慰没有权利的平民,保证正义是有的,一方面可告诫官员,短期内可逃避人世的法律,但在长期内报应是无法逃避的。

不仅是前朝人物在洪迈的宋代会出现,连古代的东西,前朝的器具都可能在后代转换成活人而出现。下面的故事关于唐代一件银酒碗,在南宋居然变成美女：

皂衣髽妇

婺源士人汪生,乾道六年春过常州宜兴,为周参政馆客。季冬之夕,有妇人自外来,通身皆皂衣,顶为两髻,貌绝美,手捧漆盘,盘中盛果馔,别用一银盂贮酒,徐步至前曰:“夫人以天寒夜长,念先生孤坐,令妾进酒。”汪且喜且疑,谓夫人不应深夜遣美妾独出,岂非宅内好事者欲试我欤？然服饰太古,似非时世装,二者皆可疑,不敢举首,亦不饮。妇人曰:“此酒正为先生设,何所嫌?”言之再三,汪遂饮。犹未半,妇人自取果恣食,又谑浪嬉笑,通绸缪之意。汪始愧恐,放酒走出。良久,复入焉,一无所见。明夜,其来如初,至于三。汪不得已,悉所见白周公。公曰:“家间寻银盂无处所,方以责婢仆,得非怪邪?”命遍索幽隐,至酒室,见古铛甚朴,盘盂皆在内,周曰:“必此物也。”举其腹视之,乃唐乾封年造,即碎之。自此无所睹。汪说。②

我们想一想,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里,当下与古代大体来说有什么样的关系？一般听到这话题,会立刻想到文学的咏史诗、怀古诗,诗人(不管是唐朝,宋朝,元明清朝)想念古代的人物,古

① 《全宋词(简体增订本)》,第 1 册,第 37 页。

② 《夷坚志》丁志,卷 4,第 566—567 页。

代的京城,古代的遗迹等等,提到这些就会联想到人生短暂,繁华易逝,名誉难保。或者想到编历史的人往往崇古贬今,习惯用古代的例子作为今天的鉴戒。我们常说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古代,是一种往过去看,甚至痴迷古代的文化,忘不了所谓“古人”“古代”的文化。

但是从《夷坚志》中的故事我们窥见另一种时间意识,另一种当下与过去关系的观念。简单地说,若在雅文学中感到现在总是望古代看,总是尊崇古代与模仿它,在这些故事中古代是忘不了未来,总要想办法再回到人间世,重新出现,借体重生,或做鬼回来履行承诺,或对敌人报仇,连古代的东西像银器酒碗都假装美人回来,想享受一下人间的欢乐。

像上面说的歌妓一样,关于当时人家对时间意识的看法,《夷坚志》的故事让我们有个新的了解,提供了与正统文体中的作品另一种面目。我们从地位低一层的小说故事,虽然仍是文言文写出的,看到不同的想法与观念。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有时候难免把正统文化现象来概括地代表文化的全部。若注意到其他层次的现象我们会发现这样不对,是一种简单化的看法,对待文化传统的多元性不够客观。

从雅俗角度看苏轼的一首诗

最后要探讨苏轼的诗歌中的一种现象,好表明这篇论文的范围不限于《夷坚志》,也不限于当时的笔记或志怪小说。提到苏东坡,大家会感到他当然是文坛中的精英大家,怎么会在谈俗与雅的对立又谈到他?其实,东坡的思想特别豁达,包括他对当时通俗文化的态度。有趣的是在这方面苏东坡思想的开明远远超过佩服他的文人与学者,而他们在这事上比起上面学界鄙视《夷坚志》的态度有更微妙的表现。为什么?因为后代的学者不太敢直接批评苏东坡,因他名誉太大了,只好找找别的方法表达他们的不满。先看东坡一首诗:

> 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于其室,自成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笔奇妙,而字不可识,云天篆也。与予言,有所会者。复作一篇,仍用前韵。
>
> 酒渴思茶漫扣门,那知竹里是仙村。已闻龟策通神语,更看龙蛇落笔痕。色瘁形枯应笑屈,道存目击岂非温。归来独扫空斋卧,犹恐微言入梦魂。①

这首诗记录东坡贬到黄州后第二年,刚过了春节,正月二十日与几位朋友到城外去探春,中午喝了酒后感到口渴,想喝茶,便敲了老百姓汪氏的家门。没想到这位农夫像巫师一样,有神仙(自称天人李全)降落在他身上,他就会拿起笔来写篆文。但文字不是一般的篆文,没有人看得懂,天人李全解释说是“天篆”,就是神仙的篆文而不是人间的篆文。

这首诗显然表示东坡对这位农夫做巫师的好奇。序文中东坡还说他虽然看不懂汪先生所写的“天篆”,但听听他(指天人)说的话也有道理。诗中的话写得更正面,说那位农夫的样子虽然粗俗但没有放逐后的屈原那么憔悴,还说看到这位先生想起了孔子遇到的做隐士的温伯雪子,马上知道他是有道者(这是《庄子:田子方》里的故事)。这都是尊敬这位农夫的话。

东坡用一首诗歌记录那天的遭遇,但是这首诗好像让后代注解或选注东坡诗文的学者感到不舒服。他们也许不太欢迎东坡这样的好奇,对农民信仰神仙有这样的态度,相信天人会降落农夫的身上,怪字会有什么功用,等等。学者们怎么表达他们对这首诗的疑虑呢?我们可指出三种方法。第一是评论家不说话,对这首诗不写评语。我们阅读东坡诗集,经常见到某一首会引起很多评论(多半是明清到 20 世纪早期的学者的评论)。若一首没有吸引评论家的称赞,就知道他们不喜欢。这首几乎没明清学者的评语,更没有他们的称赞。第二是东坡诗选本不选择它,这是另一种忽略,一种非议方法。我查了很多苏轼诗选文本,也查过很多宋诗选本,没有任何选本选择过这首诗。第三,偶然有一位评论家说话,说的却是非常短略而且含有批判的话。纪晓岚(纪昀)

① 张志烈等编:《苏轼全集校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 册,《诗集》卷 21,第 2322 页。

才写了一句,说:“温伯雪子,用一‘温’字,似未妥。”①可见纪晓岚不喜欢这首诗。他这里的反应让我们想起他批评另外一首:东坡写做梦,梦见佛僧有神奇的镜子。纪晓岚说“此种可入说部, 不可入诗集”②,也是贬损的话。

这篇论文有两个小结论。第一是所谓“俗文化”或一种接近通俗文化的思想,早在宋代已经在最高层文人雅士之间出现。第二是这种对俗文化感兴趣的雅士当然在社会上占少数。与其说他们的想法真正接近商人阶层或平民,不如说他们是超越一般文人雅士思维的局限,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很开明,仿佛登到一座高山上,能够观览而欣赏一切。靠他们豁达的观点写出一些异于传统文章,不落俗套的作品。

On the Eliteness and Popularity in Song-Dynasty Literature

Ronald Ega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Abstract: We ordinarily associat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igh-culture” literature and “popular-culture” literature with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High-culture literary expression is assumed to originate in the upper classes, while popular or non-elite literature is thought to have its origin in the lower social classes. But this way of thinking overlooks the fact that within the literary writings of the elite class, we sometimes may have already found a divergence between “higher” and “lower” registers of express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is often-overlooked divergence, concentrating on the literary writings of the Song Dynasty. In that period, there were, exceptionally, certain high-ranking scholar-literati whose social status was very high, and whose scholarly learning was also excellent. Yet their thinking was quite liberated, and they seemed eager to break free of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high culture. Consequently, these literati began to pay attention in their writings to merchant-class life and culture, allowing themselves to write about the details of this less-than-elite social class in their poems or anecdotal collections. In the Yuan-Ming-Qing period of later history, when vernacular-language literature matured, highly-educated elite writers often turned to vernacular drama and fiction and wrote about merchant-class life. But in the Tang-Song period, when almost all writings done by educated persons were done in the classical or literary language, writings about merchant-class life were still quite rare. In Southern Song miscellanies and anecdotal collections, Hong Mai (洪迈) was a leader in this type of writing in his *The Chronicles of Yijian* (《夷坚志》).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ven the eminent literati writer Su Shi (苏轼) occasionally dealt with popular-culture themes in his poems. Many conventionally-minded high-culture writers and critics of the time disapproved of these experiments, and showed their disapproval in various way,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in their critical commentaries. Still, for us today, this new direction in Song literary writings has two attractions: it sheds light on the aspects of merchant and lower class life that we seldom glimpse in elite writings, and it serves to remind us by contrary example of the many limitations in subject and tone that elite writings usually observed.

Key words: Song-Dynasty literature, eliteness, popularity, bias, Hong Mai (洪迈), *The Chronicles of Yijian* (《夷坚志》)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纪昀评:《苏轼全集校注》第 4 册,卷 21,第 2323 页。

② “数日前梦一僧出二镜求诗…… ”《苏轼全集校注》第 4 册,卷 21,第 2264—2265 页。